

## 第一章

# 晋商的崛起与发展

明朝中后期崛起并称雄于中国商界的晋商，进入近代以后，又以其票号闻名于世，在中国近代金融界一度独领风骚。

晋商的崛起与发展，既得势于天时、地利，又受益于自己的主观努力。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活动场地和物质基础。清朝的康乾盛世时期，晋商的发展处于一种有利的社会环境之中。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大举进入的刺激，国内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又给晋商及其票号的活跃以不少契机。而随着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不少人稠地窄而不得不舍本求末、外出经商的山西人，找到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他们的艰苦奋斗，坚毅顽强，及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所形成的为人处世、经商致富的理念，则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它自身及其经营上的一些特点和风格。

## 第一节

### 晋商崛起的历史背景

#### 一、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 为晋商提供了活动场地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位于万里长城的内侧。它背靠蒙古大草原，北上出大同，经绥远、归化可达恰克图，南接中州河南，南下经开封可通岭南广东；西与一河之隔的陕西相连，经西安，沿河西走廊可达新疆、中亚。可以说位扼通衢，连南接北，承东启西，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并且，由于山西处于北方游牧经济文化和中原农耕经济文化的交错地带，又是自秦汉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不断发生民族冲突、动兵用武的主要战场，因此，它在经济文化交流 and 军事防御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宋代，山西即为边防，明初为防御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曾设九边，山西为九边之一。

自古以来，虽然民族矛盾时剧时缓，但是，中原汉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间的经济交往都从未中断。汉初，山西人已经与匈奴在长城脚下互市。北宋时，在并州还设有交易市场与夏、辽交易，官市以并州西边（今兴长）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甘草……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sup>①</sup>

明初，尽管边镇形势仍很紧张，但经与瓦剌首领谈判后，在边镇还是建立了不少交易市场。在山西大同方面就有喜峰口、黑峪关、张家口、得胜堡、杀胡口（即杀虎口）、新平堡、守口堡、水泉营等。蒙古以自己的马匹、皮毛换取内地的铁锅、粮食、茶叶和布匹。

康基田：《晋乘搜略》卷 20。

交易市场的开辟，为山西商人的发展提供了活动的场地。尤为重要的是，明朝政府所置九边，都驻有重兵，所需粮草等数量相当之巨。如九边之一的大同镇，东起天城、天镇，抵宣府，西界阳河县，至井坪，边长 320 多公里，城堡、敌台、墩台达近千处，驻守马步官兵 13.5 万多人，有马、骡、驴 5 万多匹，“原额屯粮 513 904 石，草 169 190 束，秋青草 176 万束，民运山西米、麦、豆 418 660 石，草 60 万束，盐 8 万引”。<sup>①</sup> 这么庞大的军需物资，无疑为山西商人提供了一个巨大商机。为了解决这些军需物资的来源与输送问题，明朝政府采取了屯田、民运等措施，但由于北部边镇都为高寒地带，产量相当有限，难以供给十几万兵马所需的大量粮食、布匹和其他物资，并且在当时的交通颇为不便，运输手段主要又是靠肩挑背驮、牲畜运的情况下，要将数十万上百万石粮秣转运至千里之外的边镇，既增加了大量开支，又成了农民的一大沉重负担，因此，如何解决这一供需之间的矛盾，成了明朝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洪武三年（1370）六月，第一任山西行省参政提出了一个办法，他建议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陵县，米芦运到太和岭，今山西马邑），路远费重。如令商人于大同仓交米一石，太原仓交米一石三斗，发给淮盐一引，每引 100 公斤，商人纳米完毕，就可拿发给的盐引去指定的盐场领取食盐售卖，如此，既可以节省转运费用，又能减免百姓负担，解决边储。朱元璋见此法利国、便民，又可使商人赚钱，当即下旨准奏：“帝从之，请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招商中盐，以备边储”。<sup>②</sup> “开中法”的推行，使已在边镇经商的众多山西人，更放开了手脚，他们利用近靠边防、运输便利的优势，捷足先登。这中间，不少徽商、鲁商也挟资

① 《大明会典》卷 28，《边粮》卷 130，《兵部》。

② 《明会要》，《食货志·盐法》。

北上，开赴九边，使中原与南方物资源源北运。边市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激起了晋商的热情，他们为了降低纳粮成本，有的就在边境招民垦荒种地，如雁门关外诸县就有这种“商屯”，从中获得中盐粮草，实际上他们成了盐商兼粮商。除晋北外，商屯还在东北等地进行。“迤迤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耕者数千万。商人拿出财力，募民垦田”。<sup>①</sup>为了更多地中盐获利，商人在边塞争购粮食，甚至购买青苗，或向当地土著之人提供借贷资金。许多山西商人通过贩盐贩粮，不但逐渐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而且又把自己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明弘治五年（1492），朝廷改纳粮草马匹为直接向盐运司纳银领引后，商人们即把目光盯向了南方，活跃于山西解州、长芦、安徽、四川等地的盐场。居天下盐赋之半的淮南，“岁额百三十万引。向来山西、徽州之富人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扬州是淮盐集散中心，山西太原的阎家、李家，河津县的刘家，襄陵县的乔家、高家，临汾的亢家，均在扬州盐市称雄。于是，山西商人在处于垄断全国各省盐商地位的同时，边远省份也以山西盐商领先。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改引为纲后，这批盐商又获得收购、运销食盐的世袭经营特权。因此，可以说，是地处边镇的有利地位和“开中法”的实施，才使晋商得以迅速崛起。明永乐以后，社会政局安定，商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商业资本空前活跃起来，于是出现了晋商、徽商、粤商、闽商、江右商、吴越商等许多商帮。而晋商已开始称雄天下。就其资本而言，“平阳、泽、潞富家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sup>②</sup>在活动范围上，到明末，晋商已进入东北，并且进行着频繁的贸易活动，成为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政权发展东北地区经济和边境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

入清以后，随着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中原地区与蒙古地区的

谢肇淛：《五杂俎》卷40。

谢肇淛：《五杂俎》。

贸易较前更为发展。山西由于地处这两个地区的接壤之处，之前就已经开辟出了几条通经蒙古的商路，因此，它又成了南北物资运输的大通道。山西商人因势得便，把闽、粤和江、淮流域的各种物资经水路分别集聚到汉口、周口之后经开封、怀庆府（沁阳）泽州、潞安、子洪运抵太谷、祁县，经过加工分包，再继续北运，沿着旧日的军事道路雁北山区，经忻州、原平，出雁门关，至山阴县黄花梁分道，一路去东口（张家口），一路走西口（归化城），从西口进入蒙古的物资，可由归化——包头——宁夏——兰州——敦煌到叶尔羌，或由归化——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到塔尔巴哈台；往东则经张家口——多伦——齐齐哈尔到呼伦贝尔，再经北是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到彼得堡，进入欧洲市场。这条商路在山西的长城线上与明代已经形成的北京——张家口——大同——杀胡口——榆林——凉州——甘州——嘉峪关的东西商路相交叉，同时又位于形成于汉朝、成熟于隋唐的丝绸之路的东端延长线西安——潼关——太原——北京。<sup>①</sup>晋商正是凭借山西地理位置上的这一优势，而将其触角伸向内地和蒙古、东北以至国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山西为基地的商业网。

## 二、山西丰富的物产资源和发达的手工业为晋商提供了物质基础

山西煤、铁、盐等矿产资源相当丰富，农林牧业资源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且有着一定的规模。如采煤业，到 19 世纪初，作为山西主要煤炭生产区之一的晋中平定县，其境内煤窑已经星罗棋布，生产有了相当的规

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见江地主编《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6 页。

模；上元正月十五前后三日祀三官灯火辉煌鼓乐喧阗里人扮演杂剧相戏坊肆里巷土庶之家于门前围石炭烧焚之名曰塔火，一曰棒槌火<sup>①</sup>家家户户在门前烧塔火，至夜炼之达旦火焰燃烧火气上属无为之赤是谓之补天”。<sup>②</sup>晋北地区许多地方，也有这种垒烧旺火的习俗，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煤炭生产业的发展程度。在制铁业上，明代晋东南的潞安、高平和晋城已成为山西主要的产铁地区。明洪武初年，全省生铁产量达573 458.6公斤居全国各省铁产量第5位。特别是明政府诏罢各处官营冶铁，允许民营后晋中、晋南、大同等地都出现了大批民营冶铁业阳城县境内冶铸炉遍布，夜间明亮烛天，照得一条山沟如同白昼，人称火龙沟。入清之后，清廷每年在山西征解平铁（高平出产之铁俗称“平铁”）4万公斤。18世纪时晋城已是“铁冶遍于西南岁入白金数十万。”到19世纪初，全县已有生铁冶炼炉1000余座，熟铁炉百余座，铸锅炉400余座。<sup>③</sup>德国人李希霍芬说：“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以前，是有几亿的人是从风台县取得铁的供应的……大阳（晋城大阳镇）的针供应着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且远销中亚一带。”<sup>④</sup>再如在制盐业上，历史悠久的运城盐池，由于它是国家财政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又是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所以，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经过长期的开发，已形成了相当规模，“它东西长51里南北阔7里循其广袤而计之周160里”。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盐产量也大为增加，清雍正五年（1727）就产盐700万斛。行销秦、晋、豫三省172厅州县。“佐圣朝军国之需贍三省万民之食。”<sup>⑤</sup>经营盐业的河东盐商在明正德、万历年

乾隆《平定州志》，卷6，《风土》第72页。

② 《阳泉煤矿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页。

③ 《中国实业志》山西卷丙第171、172页。

乔志强：《山西制铁史》第26页。

⑤ 《河东盐法志》卷1，《盐池》，1页上。

间 由于政府进一步放宽政策 允许解州盐商“自雇夫役捞办”产品官与商伙分 因而到万历时 河东盐商达 500 余家。<sup>①</sup>入清后 顺治五年(1648) 清廷废除盐制 解盐生产改为民营 畦归商人自行洗晒,第二年又盐池分 513 号,规定一商经营一号,即有 513 家商人成为盐池的“坐商”坐商雇用大批民工生产 雍正年间 盐池即有 2 万多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此外 大同、交城的硝皮业 介休的陶瓷业 太原、临汾、襄汾的造纸业 应县的银矿开采业 清徐、晋城的醋酱业 自 17 世纪以来 也在原有的基础上 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并且陶瓷业、造纸业等还扩大到了省内的其他一些地区。

与此同时 随着新的农作物品种如番茄、棉花、甜菜、玉米、花生、烟草等的引进与逐步推广,以及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不但粮食、油料、棉花等农产品的贸易数量迅速扩大,而且过去一些利用农副产物原料的加工工业及各种轻工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如棉纺织业、缫丝业、麻织业、草席业、轧花业、面粉业、豆饼制造业、制糖业、榨油业、酿酒业、制烟业等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就都发展很快 而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在内外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一些地区则已经形成了以某种或几种轻工业生产为主的基地。

凡此,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厚实的物质基础。商品的交换、流通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晋商所以能够活跃于商品流通海洋中,应当说与山西资源的丰富以及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密不可分。

### 三、土瘠民贫、人稠地窄促使不少山西人外出经商

山西山地、丘陵多而平川少 山区和丘陵区分别占到全省土地面积的 40% 和 40.3% 平川地区仅占 19.7% 水土流失的严重 水

<sup>①</sup> 《河东盐法备览》卷 6。

资源的缺乏，加之水热资源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不稳定性所造成的干旱、春寒、霜冻、大风、暴雨和冰雹等自然灾害比较频繁，都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危害，因此，整个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加上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人民生活相当贫困。一遇灾荒严重年景，大批百姓便流离失所，外出逃荒。

此外，山西人口密度较大。据史料统计，西汉时期，山西人口为 193 万人，还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3.84%，人口密度为 13.1 人/平方公里。到唐朝时，即增加到 372 万人，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 7.91%，人口密度为 23.21 人/平方公里。北宋时，人口有所减少，为 252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7.8%，人口密度为 16.32 人/平方公里。入清以后，山西人口迅速增长。1753~1853 年的 100 年内，山西人口由 516.2 万人增加到 1592.1 万人，增加了 2 倍多。人口的增加，势必造成人均耕地数量的减少，致使人口的流动性加大。许多人不得不“弃本而逐末”，放弃传统的农业生产而走经商之路。因此，山西人外出经商者增多，也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了。

从逻辑上讲，人口密度大的地方，农业经济就比较发达，人口密度小的地方，农业经济则比较落后，事实上，山西也正是这种状况。据《晋政辑要》对光绪十年（1884）的统计，以桑干河为界，以南的蒲州府、解州、绛州、霍州、平阳府、潞安府、汾州府等 7 府州的人口密度为 96 人/平方公里。这里的农业经济就比较发达。以北的大同府、宁武府、朔平府、代州、忻州、平定州等 6 府州的人口密度只有 44 人/平方公里，仅为省南 7 府州的 1/2。这里的农业经济相对就比较落后。人口密度大的地方，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比人口密度小的地方较为严重。若灾荒一来，其经济受到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因此，人口的流动性就更大一些。自明中叶以后，晋中、晋南地区的山西人，外出经商者居多，与人稠地窄，有着很大的关系。然而，这只是导致人口流动性大，“弃本而逐末”者增多的一个原因，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育，在这些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工商业的发展 也为这些‘弃本’者提供了‘逐末’的条件。否则 这些在人口压力下被挤出局者，也就投靠无门，而只能在人口压力相对较小的地区 继续务‘本’重操旧业了。晋中、晋南地区外出经商者为多 正是由于这里较为发达的工商业 使他们有‘末’可逐。

这些外出经商者，或是先在当地活动，当有了一定的实力和基础后 便逐步向本省、外省 甚至向国外发展 或是在他乡谋生 经过苦心经营 积累了一定资本后 在当地形成了“气候”又打回老家 设立据点 内外联系 扩大经营。如明中叶以后 随着折色制的实行 晋南盐商的活动地区就不断扩大 其“足迹可半天下”。入清以后 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 已然“足迹遍天下”在东北地区“汉民至 黑龙江省贸易 以山西为最早”在昔日人烟稀少的奉天，“土著逐什一者甚少 而山西帮、直隶帮、山东、河南、东三省各帮遂纷至沓来 反客为主矣”在塞北地区“塞上商贾 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张家口上谷要地 凡内地之牛马驼羊 多取给于此 贾多山右”在西北地区 兰州东柜茶商 多山西商人 西宁城城内布店、杂货店 大多为山西商人开办 在西南地区 打箭炉“城以内所驻商贾 惟秦、晋两帮最伙”在江南地区 晋省商人也颇多 康熙帝曾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 察其市肆贸迁 多系晋省之人 而土著盖寡。”<sup>①</sup>由此可见，山西人外出经商者是相当之多的，其足迹可以说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但比较起来，他们在北部蒙古境内和西北地区最为活跃 北京、天津、武汉、南京、苏州、广州等商埠 则是其活动较为集中的重要场所 如库伦（乌兰巴托），从东营子到西库伦的广大地域，在康熙年间业已为山西商号所占据 据《内蒙地方志》载：“康熙年间有山西商人来此 库伦）

葛贤慧、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5~6 页。

经商共有 12 家。’又据陈策《蒙丰随笔》载：“库伦西帮商号始于康熙年间……西库东营两区，统计山西商人 1634 人。”在归化城 清初由山西商人建立了范家号、宏图号、天元号这三大老商号之后，在雍正至乾隆年间，又有山西太谷王相卿与祁县张杰、史大学创立了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这三大新商号。大盛魁的经营范围“上到绸缎，下至葱蒜”几乎无所不包，自称“集二十二省之奇货，裕国通商”，“步千里之云程，披星载月”。归化城市场上一些重要商品也都由大盛魁做开盘行市，如果大盛魁的货物未来，就须推迟开盘。它在归化城的贸易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人称“半个归化城”。在康熙时，张家口仅有 10 余户商店，雍正时增至 90 余户，乾隆末期增到 190 余家，嘉庆二十五年（1820）发展到 230 余家。这些商号以山西人为主，次为直隶、山东、京、津的汉回商人。山西商人在这里开设的大泉玉、大新玉、祥发家、广金泰、恒隆广等都是专营茶叶贸易的著名茶庄。<sup>①</sup> 及至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山西商人又走出国门，将其势力伸向了俄国腹地和日本、东南亚地区。

四、清朝前期的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和对发展经济的重视，为晋商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入清以后，随着明末战乱的结束，蒙古、新疆、西藏的内附，出现了中国空前的大统一局面。康熙朝历经 8 年，又先后平定三藩之乱于西南，统一台湾于东南，驱逐沙俄势力于东北。之后雍正、乾隆继康熙未竟之业，又彻底平定了葛尔丹的叛乱，实现了对新疆和西藏的有效统治，从而使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这就为包括晋商在内的各帮商人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商贸经营风险的减少，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sup>①</sup> 葛贤慧、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4、50、49 页。

与此同时，清政府不但加大了对四边农业牧业开发的力度，在黑龙江岸及其南修筑了艾虎（瑗晖）、莫尔根（嫩江）、卜魁（齐齐哈尔）、筹城，督率八旗官兵和人丁耕垦，使这些地方到19世纪初“流人回至，商贾云集，竟为内地，其街市喧闹，仿佛北省中上州县”。又调集大量军队驻防新疆，实行屯田，建立牧场。派专人前往蒙古地区“教养”，选择“田地甚佳、百谷可种”地区开垦农田，“教之引（黄河）水灌田”以改变其单一的畜牧经济，促进蒙古地区的农牧业生产。而且，自顺治到乾隆，历朝都采取了一些减免关税、商税等恤商政策。如康熙时即明令“严禁各关违例征收”。乾隆时，一方面整顿税关，裁革吏员，稳定税关经费，收到了“舟车络绎，货物流通，则税自足额”的效果；另一方面则减轻市税性质的落地税，规定：“各省凡市集落地税其在府州县城内，人烟凑集，贸易每多，县官员易于稽查者，照旧征收，不许额外苛索，亦不许重复征收。若在乡镇村落则全行禁革，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sup>①</sup>尤其对于流通中的粮食，为了调剂各地区丰歉余缺，常以更多更大范围的免征、减征关税、垫付资本、赏赐顶戴等鼓励办法，招徕商人长途贩运。<sup>②</sup>这些措施，既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又为商业的活跃创造了条件。所以，入清以后的晋商能继续在淮盐运输区域与徽商角逐的同时，还可在北方各大区域迅速扩展力量、占领市场。

在交通方面，入清以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稳定，清王朝为使其政令畅达，更好地治理各方，加强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驿站网的建设。按定制百里一站，每一驿站均备有夫、马、车、船等，一般省份，驿站上百，最少者也有十至数十，在山西就设定了125个，较明代的58个增加了1倍多，在全国由明代的第7位上升至第5位。

<sup>①</sup> 《清文献通考》征榷一。

葛贤慧：《乾隆时期的粮食调剂》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

山西处于黄土高原，境内山脉纵横，交通相当不便。历史上，虽然在大同、忻州、晋中、晋南、上党等平川盆地中形成了一些可四通八达、舟车辐辏的大小城镇，对贸易运贩提供了很大便利，如晋东南的上党，其绸与铁业的发展，使这一地区自明至清，就由商贾“转输于省直，流行于外夷”。黎城、壶关因其有通往川湖等地的交通条件，所以康熙时“潞绸所需原料丝皆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再如晋中的祁县，“祁西南道河东，通秦陇，东南逾上党，达中州，北当直省孔道，固四达之衢也”。晋南的平陆，由晋入豫者道所必经，平阳府也是“陆路则方轨并通，南下风陆，渡河即中州之陕路，关中之三辅，四通八达，无经不宜”。但是相对而言，山西通向中国西北部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商路要比通向东南部和中部的要少。

然而，清前期对驿站设置的增加，特别是在蒙古和东北地区驿道台站的增设，则为晋商到这些地区发展商业，提供了极大便利，自清代蒙古漠南、漠北和漠西三部分驿站的几十条主要线路开设后，晋商即在此基础上开辟了通向蒙古的三条主要贸易商道，即经多伦诺尔，通往漠南的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经张家口通往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库伦、恰克图、科布多、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吉克，经归化通往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伊犁、塔尔巴哈台。在东北地区，清康熙时设置的从青峰口到齐齐哈尔的驿站，也成了晋帮商人北运茶、绸、布、瓷和南北皮毛、山珍、麝香的重要商路。清政府设置的这些驿站，其主要任务虽然是传达中央政令的邮传之路，但客观上也成为连接各省府州县的交通干道和商旅之路，为商品交换活动由城市向乡村的渗透，由中原地区向东北、西北地区的扩展，并建立永久性的贸易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可以说，晋商能够将其势力扩张到蒙古和东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与清代前期

对水陆驿站，特别是在这些地区的驿站的迅速扩展，有着极大的关系。

## 第二节

### 晋商及其经营特点

#### 一、晋商的特点

晋商在其长期的经商和社会实践等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纽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家庭、家族组成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血缘关系，不仅是家庭、家族得以繁衍延续的基础，也是维系家庭、家族内部各种关系，保持其和谐团结、兴旺发达的纽带。一般而言，以农耕为主业的民族，为保持其生产和生活的更趋稳定，尤为重视这种血缘关系。特别是由于儒家对‘亲亲尊尊’思想的倡导，在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种观念更为浓重。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秦时期儒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对血缘关系更为认同。山西商人，虽然已属弃本逐末者，但因受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仍十分重视这种血缘关系。其先辈们为使自己所创的家业，能够传继下去，总是按照严格的嫡庶之分，将其家业传予自己的嫡子嫡孙，并且从对内亲和外戚的区别上，先择其内亲辅佐经营，而后才是外戚，从而形成了一个在血缘关系下以嫡系为核心、以内亲为基干的经商世家或商贾望族。如盐商中的蒲州籍盐商王家、张家，介休籍范家，平阳籍亢家等。蒲州人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奔波一生、‘足迹半天下’的商人。

张四维的舅父王崇古，其祖父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正，其父王瑶先后在邓州、襄阳、陕西、河南鲁山、甘肃张掖、酒泉等地行商，积累一定资本后，贩盐于淮浙间。王崇古之兄王崇义则是长芦盐商。王崇古的伯父王文显也是长芦盐商。王崇古的长姐嫁给了沈廷珍，其长男沈江是随其父活跃于扬越的盐商。张四维的四弟张四象，前妻王氏家亦是商人，王氏去世后，其继妻范氏家还是商人。范氏祖父范世逵在明初实施开中法后就经营盐业。<sup>①</sup>山西平阳府富商亢氏“家巨富，仓廩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亢氏除经营粮店、当铺外，还在扬州业盐，曾与扬州“盐务商总”的安麓村齐名，有“北安西亢”之称。介休的范氏，早在明初已在边塞地区行商，历经七代，传到范永斗时已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商人。清入关前，范永斗即充内务府皇商，清入关后，范永斗在其子范三拔的协助下，利用皇商特权，插手盐、铜运销和对外贸易。范三拔之子范毓宾、范毓奇、范毓章为清廷运送军粮，建有功勋，范氏在直隶、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都设有盐店。

除了这种血缘关系之外，在外经商的晋商，还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组织和发展起了一些以同乡为主的商帮，如太原帮、汾州帮、闻喜帮、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以及祁县帮、太谷帮、平遥帮。并且建立了同乡商人会馆，随着商业的发展，又建立了专业性会馆。雍正五年（1727年）在北京的山西烟商就曾建立了河东烟行会馆。清季，在汉口的山陕会馆，包括了许多行业和山西境内的区域帮商人。

## 2. 思想理念

晋商思想观念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以下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

葛贤慧、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8页。

(1)崇尚功利 积极进取 以义制利 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山西商人不安于本土贫瘠苦寒的生活现状，能够不畏艰苦，跋涉千里“牵牛车 远服贾”克服种种困难，“入巴蜀 沿长江 下吴越 已又涉汾晋 践泾原 迈九河 翱翔长芦之域”<sup>①</sup>，东北至燕、奉、蒙、俄 西达秦、陇 南抵吴、越、川、楚”致使“齐晋秦燕越诸大市 执商界之牛耳 咸晋人。”<sup>①</sup>即使筑城驻兵之处 亦建室集资 行营进军 亦尾随前进 虽锋刃旁舞 亦未肯裹足 军粮被劫 自己出资再筹，一个很重要的信念 就是“求富益货”把从事经商活动看成是追逐功利，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正当行为，因而不顾千难万险，总是一往直前 积极进取。

但是 他们却不见利忘义 为富不仁 为富不义 而是以道德信义为根据，先义后利。王文显初为举业不成而经商，他适时机变，恪守信义 成为富商大户后 曾训诫其子曰：“夫商与士同心 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sup>②</sup>清中叶，晋商曾以票号业而闻名于世。但仍对信义崇尚不衰。票号在培育人才时 除业务训练外 还把“重信义 除虚伪 节情欲 敦品行 贵忠诚 鄙利己 奉博爱 恨嫉薄 喜辛苦 戒奢华”，作为对职员学徒职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2)好儒与重商兼顾，儒商结合。晋商大多数人对于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十分崇尚，有的甚至还崇尚法、兵各家，但仍以儒学为主。他们把儒家思想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为此，他们不仅把儒家的这些信条当做自己正心、修身“而杜邪教之入”的必修课，而且把它作为其所办学堂和商号的宗旨。如河东商人在元

葛贤慧、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25 页。

〔明〕李梦阳：《空洞集》卷 44，《明故王文显墓志铭》。

大德三年(1299)兴办的商人子弟学校——河东运学,其办学宗旨就是“师道立而教化行 理义明而风俗美”。清时的大德通票号则“命阖号同人皆读《中庸》、《大学》”在大德通票号的极盛时期仍然“黜华崇实 不为习俗所移 且益加慎敏 延名师教育青年伙友, 讲名著培养立身基础”。有些商人虽然经商有成,以商致富,但却对商表现出了轻蔑。如盐商王文显之父,告老返乡后,对为王氏之兴立下汗马功劳的长子王文显不但不予以厚爱,反而首先将王文显分家出去 而当文显弟王珂举于乡时 其父却高兴地说:“兄商而利 弟仕而名 乃吾今何憾矣。”<sup>①</sup>又如盐商杨近泉,虽为两淮盐荚祭酒,却“独喜与士子游”。当其子杨岫举于乡时,他在淮上闻讯后 掀髯喜曰:“夫我乃不以儒显 儿子以儒显矣 尚何事贾 即日弃资斧北还 与乡老结社觞咏为欢。”<sup>②</sup>

正因为晋商重儒的思想比较严重,所以,许多人把追求功名,进入仕途 看得很重。过去有人曾认为“山右积习 重利之急 甚于重名 子弟俊秀者 多入贸易一途 其次宁为胥吏 至中才以下 方使之读书应试 以故士风卑靡”,<sup>③</sup>以此来说明晋商重商轻儒。但事实上却并非完全如此,对于晋商而言更非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山西人的名利观念的确发生了一些重利甚于重名的变化。然而 就晋商总体来看 重名之念 仍是很强烈的 其中有的人虽然屡试不第,而对仕途表现了厌恶,但他们仍是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够有朝一日步入仕途的。再从明清以来一些大商贾的行迹来看,不少商人因对朝廷有功,成为皇商后,不仅对朝廷的加官晋爵不予恳辞不受,反而欣然从命,感激涕零,并且还恳请朝廷为其已故之祖父

刘德仁、薛培:《略论清政府对盐商的控制与利用》,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明〕李梦阳:《空洞集》卷44,《明故王文显墓志铭》。

<sup>③</sup> 葛贤慧、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4页。

母、父母追封爵位 给其父兄子侄捐官买官。如日升昌、元丰玖、志诚信、锦生润、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就都买有各级职衔。平遥日升昌票号东家李箴视，除自捐官衔外 还为其已故父亲、祖父、曾祖父及其兄弟 7人和下一辈男子 12人 捐有各等官衔 妇女则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翔，从其父到玄孙五代 31名男子 均捐官“将军”、“大夫” 女子亦都“夫人”、“恭人”。<sup>①</sup> 不仅如此 大多商人 还捐资兴学 开办私塾 聘请名师宿儒 让其子弟寒窗苦读 以图尔后出人头地。

然而 在晋商中 好儒与重商兼顾者也不乏其人 在他们看来，好儒与重商不仅不矛盾，反而可以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他们认为，只有对儒家文化有深入地学习，才能更明白立身为人、处世办事的道理，也才能在商贾活动中伸展自如、进退有据。这一点，盐商王文显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商与士 异术而同心 所以善商者 身处财货之场 而修高明之行 是故虽利而不污 善士者 引先王之经 而绝货利之经 是故必名而有成 利以义制 名以清修，各守其业。”<sup>②</sup> 晋商的大多数人虽然他们的文化修养并不怎么高深，但却能够较好地处理自己与社会各界同行和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提高自己的经商品位，赢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认可，取得巨大的商业利润，这都与他们这种儒商兼顾的理念有着重要的关系。

(3)积德行善，急公好义。晋商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等的崇尚，使其养成了积德行善，急公好义的良好品德。其中的大多数人致富后 富而不骄，一般都乐善好施 积德行善。如临猗人阎天杰 经

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见江地主编《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295 页。

嘉庆《江都县志》，卷 12。